



海上丝绸之路综论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编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中国海交史研究丛书
(一)

 海洋出版社

中国海交史研究丛书（一）

海上丝绸之路综论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编

海洋出版社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丝绸之路综论/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12

(中国海交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027-9992-2

I. ①海… II. ①中… ②福…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6133 号

责任编辑:张 荣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 mm×1092 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80千字 定价:96.00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序

陈高华

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海上活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一个海上强国，为人类征服海洋的活动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海外交通的开辟和发展，是人类征服海洋活动的主要方面。

先秦时期，居住在我国沿海地区的百越、东夷，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积极从事海上活动。沿海交通日趋频繁，对海外未知世界的探索亦已开始。公元前3世纪徐福出海寻求海外仙药，一般认为这是见于记载的中日交往的开端。实际上，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应比徐福出海事件更早。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西汉王朝的使节已在南海航行，有可能已抵达印度洋区域。公元2世纪，东汉与大秦（罗马帝国）通过海道开始发生联系。公元3世纪上半叶，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这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促进了中国与南海地区的联系。公元5世纪，法显的经历和见闻说明印度洋地区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相当频繁。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有着密切的海上联系，众多僧人往来于中国与印度洋之间，弘扬佛法。

8世纪，唐朝贾耽记载了通往海外的两条航路，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自广州海行，经东南亚和印度半岛，直抵波斯湾头及阿拉伯半岛。一条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自登州发船，沿渤海湾至鸭绿江口，再沿朝鲜半岛西岸南下，便到高丽，向前延长可到日本。特别是前一条航线，是我国也是世界文献中关于这条横贯东西漫长航路的首次详细的记录。

宋元两朝是我国古代海上交通发展的巅峰时期，航海技术的发展，造船工艺的进步，对于海外交通事业的开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一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及其海上事业的活跃，对于中国的海外交通产生了明显的刺激。发生联系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较以前有明显的增多，出现了关于东北非、阿拉伯半岛、菲律宾诸岛的比较准确的记录，关于南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记载也更为明晰。

明代我国的海外交通由盛转衰。明初郑和下西洋，乃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上最

伟大的壮举，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所到地区之广，无论在中国历史上或是世界航海历史上都是空前的。郑和航海是在宋元海外交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郑和航海以后，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加上明朝政府对海外交通采取消极态度，中国的海外交通逐渐趋于衰落，中国的海船不再在印度洋出现，活动范围限于东南亚和日本、朝鲜，即使在这些地区的活动也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排挤和压迫。继起的清朝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人的海外交通受到种种限制，中国的海域成了西方殖民者船只活动的场所。但是民间的海外贸易仍有相当的规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足以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的海外交通活动，处于世界的前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祖先在海外交通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应该认真研究中国海外交通的历史。但事实上，我国的海交史研究却起步晚，并长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依靠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将汉文文献中的记载和其他文字文献对勘考订，对中国海外交通史做出许多有益的贡献。日本学术界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成绩。相形之下，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自守状态，清代学者对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关心者殊少。用近代科学方法开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严格来说，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订、考古调查以及翻译外国有关学术著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朱杰勤、姚楠等前辈学者，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至今嘉惠后学。

从1949年到1966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史学研究的力量集中在少数重点课题上，包括海外交通史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潜心于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向达对海上交通史料的整理，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田汝康关于17—19世纪中国的帆船业，张维华关于明代海外贸易的研究。还有章巽、朱杰勤、庄为玠、韩振华、周世德等都有关于海外交通的精辟之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科学研究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亦不例外。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许多学者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继续为推进海外交通史的研究而努力。1973年开始的泉州古代海船的发掘，就是他们努力工作的明证。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也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发展规模之大，是前所未

有的。我国的海交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泉州湾古代海船的发现与研究，以及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成立，《海交史研究》杂志的刊行，对于海交史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以东西方对话为主题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在泉州举办的三次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学者提交的众多会议论文，大体上反映了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成就，并得到了与会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我国的海交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

20世纪，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我国的海交史研究，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经有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无论从质量或数量来说都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而这样的研究队伍在步入21世纪又将中国的海交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新世纪的中国海交史研究呈现了以下特点，一是加强了多学科之间的协作。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已经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海交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涉及范围很广，既与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又涉及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自然科学（地理学、海洋学、医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船舶制造、陶瓷工艺、丝绸工艺）等许多学科。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海交史研究不仅在领域上拓宽了许多，而且各学科之间的协作研究更加密切。二是海交史研究领域学者的眼界不断放宽，更加关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中国的海外交通，实际上就是中国与海外地区的关系，必然受世界历史变迁的影响。中国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三是海交史方面的资料整理有较大进展。如大连海事大学编有多卷本的《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用于海洋航行的更路簿、针路簿等在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多有发现，现在有人专门在收集、整理这类资料，并有不少成果。另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国海域辽阔，海底沉船和各种与海外交通有关的文物，数量惊人。水下考古迅速发展，成果显著，将海交史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局面。

2013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并不是偶然的，与我国学术研究方面的长期准备有密切联系。海交史研究为这个宏观的战略蓝图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反之，“一带一路”倡议又为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海交史提供强劲的动力。借着这一机遇，我们的海交史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出版说明

《海交史研究》创刊于1978年，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之一，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

在历任主编的指导与努力下，《海交史研究》汇聚了海交史研究领域的众多优秀成果，至2016年下半年已连续出版70期，发表100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航海史、造船史、港口贸易史、中外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外来宗教、外销陶瓷、海外移民、海交民俗、海交文献等各个专题。在这些文章里，不仅展现了前辈渊博的学识涵养和学术经世的爱国热忱，还反映了后学对新研究方法与新理论的求知精神，而海外学者的研究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视野。

《海交史研究》既是学术交流的阵地，又是学术成长的平台，30多年来，众多学者在这方学术园地绽放异彩，自觉承担弘扬中华海洋文明的使命，为中国海外交通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3年，建设“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为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海交史提供强劲的动力。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海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资讯服务，我们将从《海交史研究》中遴选出具有一定代表性、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并按不同的专题分类结集，陆续出版“中国海交史研究丛书”。

本丛书在“不改变原文风貌”的前提下，编例如次：

（一）作品按研究对象所属朝代先后排序；（二）为使丛书体例一致，引文、注释尽量参照《海交史研究》2016年以来所采用的通行格式；（三）内容不作增删，仅对文字方面的错讹、脱漏之处进行校正；（四）尽力将作品的引文与原始文献进行比勘校正，但仍有不少引文由于缺乏版本说明，或没有标注出处，或引自海外文献等问题，以致校对力有未逮。

编者虽已克尽厥职，但囿于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方家指正。

目 录

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	杨 熹(1)
对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管见	朱杰勤(16)
论海外交通史学科性质及其内涵与外延	孙光圻(24)
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龚纓晏(33)
论大航海时代及其四个阶段	张 箭(41)
海洋史与世界史认知体系	[韩国]姜凤龙(49)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和交流	金秋鹏 杨丽凡(57)
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吴 泰(67)
唐代的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的发展	汶 江(81)
宋代海外贸易和东南亚各国关系	卢 苇(97)
元代的开放政策与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	汶 江(109)
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喻常森(122)
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	
——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	陈尚胜(139)
明代后期海禁开放后海外贸易若干问题	黄盛璋(152)
关于明清(鸦片战争前)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陈柯云(168)
中国航海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朱杰勤(182)
海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高华(199)
冯承钧对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	郑鹤声(205)
朱杰勤教授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	卢 苇(219)

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

杨 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有 56 个兄弟民族，共同劳动生息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富饶的国土上。自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各族先民之间，在无阶级压迫的基础上，相互交叉比邻而居，彼此经历了几千年的血统交融，文化互会，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坚如磐石亲如手足的中华民族，同时也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

一、海洋文化的南北交流

中国东部沿海所居的先民，古代统称作东夷，但因族系不同，又有九夷之称。夷是一个支系众多的部族，有十数种名称，九夷者盖言其多之意。据《越绝书·吴内传》记载的释文说：“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① 观《史记·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注明“东夷之士”。^② 据此，夷就是海，东夷与东海同义。足见中国东部的夷人便是习于海上活动的海人。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便是带着海洋特征的文化。

中国海洋文化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系统，一是北方沿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二是南方沿海的百越文化。

（一）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以 1928 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而命名的，它起源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是 1959 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和堡头发现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址，以后在山东和苏北等地陆续有所发现，于是便将同一类型的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经碳 14 测定，它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4700—4300 年，距今已有 6 600 多年，它是与仰韶文化东西相应平

^① 袁康：《越绝书》卷 3，《吴内传》。

^② 司马迁：《史记》卷 32，《齐太公世家第二》。

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它主要分布在汶、泗、沂、淄、潍等水的流域和山东沿海一带，南面远及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近年来，在河南的平顶山、偃师、郑州、辽宁的大连，也不断有所发现。在山东境内和江苏北部，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地与龙山文化的分布地区大体一致。如果把大汶口晚期陶器的造型风格与龙山陶器相比较的话，便清楚地看到，龙山文化是承袭大汶口文化而生成的，属于一种原始文化体系。^①尤其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遗存文物最为典型。龙山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是半月形偏刃石刀、长方形偏刃石斨、矩形石斧、轮制细泥黑陶，其中薄到0.2~0.1厘米的蛋壳黑陶尤为引人注目。

龙山文物中的石斨与百越文物中的有段石斨，经考古专家的调查和鉴定，认为是加工独木舟的专用工具。^②可见“龙山人”与“百越人”都是长期生息在沿海地区乘舟弄潮为生的先民。

龙山文化的遗址分布范围很广，主要是在山东、辽东半岛和苏北等处沿海各地。但在河南、河北、陕西、湖北、山西南部、安徽北部、张家口等地，也有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在河北、河南的遗址中，经常见到与仰韶文化叠压的现象。在甘肃发现过疑似龙山文化遗址一二处。假若以龙山文化发源地的山东沿海为基点，参照近代考古发现的分布区域，便可以看到龙山文化是分作两条途径向外传播的：一条路线是从海上传到辽东半岛及海外；另一条路线是从沿海向内陆发展。从现代发掘中可以判明，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仰韶人带着自己的文化，从黄河中上游向东移，龙山人从沿海向西迁徙，终于在河南交会，生成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两个分支。在南部沿海与百越的良渚文化同地共存，在西北地区与游牧民族的细石器文化，发生了积极交融和互会。^③

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交叉地区的河南西部，这里龙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便融合了仰韶文化的风格。在浙江杭县和苏北发现的龙山文化遗物上，都呈现了百越文化的色彩，张家口的龙山遗存上，渲染着细石器文化的特征。它一方面保持着龙山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体现了与当地原有文化互会的交融性，显示了相互之间的深刻影响。在甘肃仰韶文化的墓葬遗址中，还发现了卜骨，证明在仰韶人生活习俗中，已吸收了龙山文化的内容。这些交融互汇的现象，已孕育着中华民族文化的雏形。

龙山文化的另一条传播途径，是从海路渡过黄海和渤海，传入辽宁东半岛或

^① 山东博物馆：《谈谈大汶口文化》，《文物》，1978年第4期，第58页；夏鼎：《碳14测定和大汶口文化》。

^②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斨》，《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15页。

^③ 吕振羽：《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163页、第261-262页。

海外各地。1927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市皮子窝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195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大连市的大台山和王庄寨又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两处出土的文物，与山东半岛西北部沿海所见者基本相似，石器打制多于磨制，陶器全是手制。皮子窝发现的贝塚遗迹及其红褐或青灰陶器，与隔海相对的山东龙口贝塚遗物类似。与龙口相近的即墨县姜家泊，也出土了相同的夹沙红陶和夹蛤蜊壳或云母片的粗灰陶，还有少量的粗质黑陶。渤海南北两岸的遗址，是属于龙山文化早期文物的传播^①。关于它的传播途径，过去因考古资料不足曾认为龙山人是环渤海徒步到辽东的。但根据近代考古发掘所见，龙山人行进留下的足迹，到河北唐山的大城山而止。其东便被辽西沙锅屯仰韶红陶所隔断。从龙山遗存分布实况来推断，龙山文化是渡海迁播到辽东的。近年来由于在渤海湾南侧靠近蓬莱的长岛，以及在北侧靠近皮子窝的大长山岛两处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已肯定了辽东的龙山文化遗存是由山东航海传播而去的。当沈阳北陵新乐地方的新石器遗址被发现以后，渤海湾两岸的航海交往便进一步完全证实。在北陵新乐遗址中，有与细石器并存的篦纹陶系统的陶器，在器形与纹饰上自具特征，显然不属于龙山系统，而应该属于与游牧有所渊源的东北民族文化。这种篦纹粗质红陶，在大长山岛上的马石贝塚遗址中也被发现，而且是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下，经碳14测定，断为6600年前的遗物（前4670—前4195年）^②。由此可以纠正过去认为东北文明是由龙山文化渡海北迁而推动开发起来的失误。其实在接近7000年前，东北地区的先民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且渡海向南传播，与初期龙山文化互会于中途海岛之上。双方都是以海洋生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民族，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遗弃下成丘的贝壳，叫做贝丘或贝塚，其中保存下代表他们文化的遗物。在辽宁丹东，盖县和隔海相望的山东龙口等地，仍时常发现贝塚，说明当时这里留居过以海洋为生的先民，经过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交融成一个族系，然后又迁徙到东北内陆地区或山东沿海各地，在渤海湾及黄海北部遗留下他们逐岛前进的足迹。说明“龙山人”已超脱出被风浪灾害任意漂泊而至的局面，进入了在海洋上有目的追寻生活资料的航海境地。随着“龙山人”活动的行踪，现在见于山东莱芜的石棚墓葬遗存，也被带到大连附近的金县、复县和朝鲜南部，在这些地方，石棚墓葬仍有发现。

带有海洋特征的龙山文化，是我国境内四大主干文化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很广，对其他系统的新石器文化起着主流作用，推动和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形成。龙山文化发展到后期，已上升到社会变革的前夕。在济南大辛庄和唐山

① 吕振羽：《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第278页。

② 《中国陶瓷史》第一章。

大城山晚期龙山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除有大量石器以外，也发现了铜刀、铜锯、铜针、铜镞等铜器。这些文物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已近于结束，相应的氏族原始公社已开始瓦解，同时第一个有阶级压迫的奴隶社会，有可能开始诞生。

（二）百越文化

百越文化是以有段石磬和印纹陶器为其特征的新石器文化。百越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越人。“越”本是国名，其族是“闽”，后世习以“越”称，有时称其为南越，以示所居在中原以南国境之内的位置。有时是泛指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同系而分支的多个部族，史界称其为“百越”，以示支派繁多之意。百越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各省，并向安徽的长江两岸、江西赣江流域和两湖等处传播。另一面向北，在江苏北部与仰韶、龙山两大文化系统交融，同时形成青莲岗文化并会合仰韶人、龙山人组成共同劳动生息的混合部落。自古以来，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①，是一个濒海而居，以渔捞为业而善于操船航海的民族。他们各分支部族共同创造的百越文化，其内涵一致，但又各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它一面向内陆传播，一面航海而去，流传海外各地。即使从内陆所发现的百越文化遗址来看，主要分布在江河湖泊沿岸，体现了越人依水为生的特色。百越文化的陶器的主要特征是印纹陶，是一种印有几何形纹饰的陶器，但另外也有夹沙质陶器。从其发展来说，泥质或夹沙质陶早于几何印纹陶，而印纹软陶又早于印纹硬陶，所以在其早期遗址中，多见泥质陶、夹沙陶、少见或不见印纹陶。凡发现印纹陶的地方，同时也多见或必见有段石磬。像在河姆渡的百越文化遗存中，就有大量的陶片和有段石磬，过去推论百越文化发源于浙江沿海，这种推测从当今考古发现来说是已经成立了。随着越人的迁徙，百越文化也同时向四方扩散传播。在浙江本地，除考古学上著名的古荡、良渚、钱山漾等遗址外，在钱塘江流域各县、市和北至太湖沿岸，东至沿海，南至温州、衢州等地的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几何印纹陶器和有段石磬。在江苏、上海近郊的淀山湖、昆山，还有吴县、无锡、南京、苏北等地均有同样的发现，安徽的芜湖、马鞍山等沿江各地及湖北的蕲春、湖南的安仁都有几何印纹陶和有段石磬的遗存。至于河南、山东境内偶有少量发现。向北，最远在辽宁省大连市也曾发现了有段石磬和印纹陶器，可能是从浙江或福建航海流传过去的，这个问题，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作出结

^① 袁康：《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第十》。

论。向南，福建全省各县几乎都有新石器遗址，各遗址中，主要是百越文化的遗址，如除著名的昙石山遗址，闽南的华安、武平、厦门、南安、惠安、龙岩、连江以及闽江下游和闽西各地，都有大量的印纹陶与有段石磷的发现。如1954年，在长汀的河田遗址，一次便发现磨制石器1310件和大量陶片，其中有段石磷83件。在广东省的广州市、南海、番禺、新会、宝安、香港以及北江的英德、翁源、清源，东江的海丰，海南岛的文昌都发现有段石磷和几何印纹陶。从这一文化系统遗址的分布范围来看，在中国东南沿海，自远古时期便居住着属于近亲、或彼此有着深厚影响的部落或群团，他们是“百越”系统内各分支的越人。

1975—1977年，在浙江余姚发现了百越系的河姆渡新石器遗址，经碳14测定，是7000年前的遗存（前4887±96年）。在与其他地区的发现比较后，看出一方面百越文化从东向西，向北扩散的事实；一方面也反映了向浙东沿海及海上岛屿传播的途径，经浙东沿海发展到舟山群岛。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口以南和甬江口以东的东海上，由舟山本岛及岱山、嵎山等大小近600个岛屿所组成。近年来发现了百越文化遗存八九处，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十字路、塘家墩、孙家山。

十字路在本岛的定海，1975年发现有属于河姆渡第二层文化类型的遗存，距今已有5500多年，是至今在舟山群岛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塘家墩遗址也在定海，时间稍晚于十字路遗址，距今约有5000年。孙家山遗址在岱山的大衢岛，出土物多属于河姆渡一层文化类型，是5000年前的遗存。除以上三处遗址，在定海湖面、岳山馒头山、嵎泗菜园镇等也屡有发现，不过时间上都在4000年左右，晚于十字路、孙家山等地的遗址。这些原始文化，是越人从大陆航海带到舟山群岛的。这些遗址，像珠宝一样散落在各岛屿之上。如果串联成链，便显示出—条海上航线，描绘出5000年前越人开发沿海岛屿的航海图卷，并由此前进，乘风破浪，跨东海而达台湾。

百越文化，是台湾省文化生成的根源。

世之论台湾与祖国关系者，多是以《三国志·孙权传》为据，以东吴派卫温、诸葛直去夷洲一事作为最早的文献记载。其实不然，若从台湾的人类起源来说，根据我国华南区第四纪的地质资料所记，在第三、四纪之间，台湾和琉球群岛都与祖国大陆相连，在更新世时，台湾西边才有了狭长的海湾与南海相通，但西北端仍与大陆连接。大陆上的古人类与古生物，都通过陆桥移徙到台湾。1970年夏，在台南左镇乡发现“左镇人”的顶骨化石，经氟、锰含量测定，推定为一万至三万年前的人类骨骸。经专家鉴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属于“北京人”的一支，与“山顶洞人”时代相同，是从祖国大陆移入台湾的，为迄今在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968年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现的新、旧石

器遗址中，其出土的石器与我国大陆南部出土的旧石器对照，不论从制作技术上，还是基本类型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别。^①新石器时期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段石磬，在台北也有大量的发现。^②考古学的发现，证实台湾人与越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同属于我国百越族的一个支系，如杨越、骆越、闽越一样，他自有其名，叫做外越。据《记地传》上说：“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③当时勾践所统属的既有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大越，又有东海之内的内越和海外的外越。同书又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灭越国，将勾践所在大越地方的人民强迫迁徙到江、淮、徐、泗各地，又将大越更名为山阴，并把全国罪犯囚徒迁到大越，以屯戍之法防备东海外越。^④

当时秦始皇迁民屯戍，主要因为“百越叛去”，是为了防范外逃的内越与海外的外越勾结而作的措施。说明外越实有其族，而且实有其地。关于外越居处，在汉代初年已于多处文献中提到。汉武帝时，距秦始皇之世为时不过百年，当时东越曾多次反复，《前汉书·朱买臣传》说：“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今福建泉州），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⑤文中所说的东越王所处的大泽，在《方輿胜览》中“环岛三十六”条上记载说：“自泉（州）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⑥巨浸与大泽含义相同。勾践所统属的东海外越，显然是指澎湖、台湾。《汉书·地理志》记：“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⑦因汉时将闽越归属于会稽统辖，此“会稽海外”是指浙闽两省的海外，“鯷”与“台”同音，此处所指之东鯷即为外越台湾无异。三国时，东吴在浙江设临海郡，辖领台湾，临海郡的地方志书名《临海风土志》，其上对台湾记载颇多。《临海风土志》记载说：“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人皆髡头穿耳。”又说：“夷州”呼民人为“弥麟”。“越王射的”石，正是勾践统辖台湾的传说古迹，“弥麟”二字缓读即为“闽”字发音，由此得见，闽越与外越有同种同文的关系。“人皆髡头”，是与越人断发同俗。^⑧从旧、新石器时期开始，台湾便是我中华民

①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台湾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

②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磬》，《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4页。

③ 袁康：《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

④ 《记地传》：“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郢，因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⑤ 班固：《前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

⑥ 祝穆：《方輿胜览》卷12，《泉州》。

⑦ 《前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

⑧ 李昉：《太平御览》卷780，《四夷部》（一）。

族的外越聚居生息之地，台湾各族人民是我中华民族的手足兄弟。从行政区划上来说，早自春秋末期台湾即是勾践统属的三越之一，对台湾的统辖和开发，远自百越文化时期便已开基创业，实不只从孙权为始端。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百越文化、细石器文化，我国这四个文化系统，在各地和各分支族派之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向北和向内陆发展的越人，走到中原及北部沿海先进文化交叉接近的地方，与南下的仰韶人，西去的龙山人，会合在一处混杂共居，彼此影响得越早、越深，共同生产合作得越密切，便从生活习俗上、生产方式上、意识形态上，甚至血统交融上，日益构成一体，形成了我国的主流民族——汉族。汉族之称起源于汉朝刘邦立国之后，凡在汉朝邦畿之内者统称为汉民，后则以国名为族名。实际在客观上并没有一个典型的汉族血缘标准。它是四大文化系统先民的融合体，越接近后世，这种融合越广，越牢固，如水乳交融，难隔难分。

在远古开始四大文化系统交叉互会的时候，散居在边远地区的各族，彼此不如交叉比邻而居者的影响深密，便保留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存在着更明显的差异。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柴达木盆地、西藏的黑河地区，即草原、沙漠、森林等所谓的边疆地带，都是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而在陕、甘、晋、冀与少数民族邻近的仰韶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中，也夹杂有细石器文化的遗物。考古学发现所显示的这种远古实况，反映了沿海到中原，各族共居和边疆兄弟民族分地分居的状况，是与我国当代疆域和民族分布状况相一致的。证明早在千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居住地便已经固定下来了。各民族之间互相推进，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多族融汇的中华民族，并且创造了以海洋文化为主体的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无可辩驳地摧毁了中国人西来的瞽说和不习于航海的谬论。

二、海洋文化的海外传播

当代人往往过低的估计远古人的航海能力。原始社会人的航海技术水平如何，这一点很难作出准确无误的答案，只能从各地出土文物的源流，或从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上考察，如果他们之间有多处相同，却又远隔重洋的话，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之间曾有远古人航海的事实。龙山人和越人，视汪洋如平地。习于航海，随其海上活动，他们不仅将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迁播南北沿海及近海岛屿各地，同时也向远海扩散，所航历的海程，有令人不可思议之遥。据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考察所见，在山东、辽宁出土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这种龙

山文化的石器，在朝鲜、日本及太平洋东岸也曾见到。在大洋洲的木器雕刻上，有些动物形的纹饰，与中国铜器饰极为类似。北美阿拉斯加也出土了中国的陶器。^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伊文思夫妇和厄瓜多尔的爱斯特拉达，在厄瓜多尔的瓦尔地维亚遗址发现了绳纹陶器，一时曾推论是日本绳纹时代陶器横渡大洋到达美洲的遗物，后来经过土质分析，美洲绳纹陶的土质与日本土质不同，但也未说明是何等土质。绳纹陶器原出于仰韶文化，仰韶陶器是以少数彩陶为特征，以多数绳纹陶为主体的。美洲发现的绳纹陶器，未必不是从中国航海经日本向东延伸过去的，或由精于制陶技术的仰韶人或龙山人在当地烧制。这不过是据文化渊源的推论，像是大汶口文化中有一种拔牙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日本绳纹时代，已从中国流传到日本，同时中国北方的绳纹陶器，很可能随风俗一齐流传到日本列岛。这些推论，还有待美洲考古界的证实。至于东南沿海越人文化的外传情况，在日本松本广信的考察中，曾说到他在印度支那地区和日本，都发现了中国的有肩石斧。^② 有肩石斧是百越文化有段石磷同物异名，有段石磷不仅传到邻近岛屿，并且传播到大洋洲的各岛。以上各地与中国远隔重洋，而当新石器时期，相连接的自然陆桥久已沉没海底，除航海传播而外，别无通途。龙山与百越文化的文物能在这些地方出土，说明远在六七千年或迟至四五千年以前，龙山人和越人的航海水平已能远涉重洋。他们的航海里程和航海范围，足以显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的航海状况。

有段石磷，是百越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有段石磷在东南沿海各地的遗存最多，华北东部和辽东半岛略有少数发现，华北西部至今还没有发现过。有段石磷是一种形制奇特的磨制石器，它体形长方扁平，刃口斜削似铁镞的创刀形状，这些都与一般石磷相似。但它特殊之处却在背面，即刃口斜上所向的一面不是正平面，而中部隆起成为一条横脊，将背面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部较厚，后部较薄，成为两个有阶的分段。关于它的定名，由于发现的地点不同，时间又有早晚之差，其称不一。1929 年和 1936 年在台湾和杭州古荡发现者被称石磷，注明其背有棱。1937 年在杭州良渚发现的，又叫做石凿、石钺、石戈。同年福建武平发现的，在英文报告中叫做 Chamfered adze（有沟纹石磷）。1932 年在香港南丫岛发现的，被称为 Stepped axe（有段石斧）。1937 年发现于广东海丰者，又被叫做 Unjuiform adze（爪形石磷）。日本考古界称为圆山式片刃石器，菲律宾称作 Luzon adze（吕宋石磷），或叫 Philippin adze（菲律宾石磷），又称 Ridjed adze

① [日] 滨田耕作：《东亚文化之黎明》。

② [日] 茂在寅男：《世界航海史》；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日] 松本信广：《人类学杂志》。

(有脊石磬), Tanged adze (有柄石磬)。在太平洋诸岛地段石磬的东南亚考古学、民族学家, 德国人海尼·格尔顿 (Robert Heine-Geldern), 用德文称 Stufenbeil, 用英文称作 Steppod adze (有段石磬)。我国考古学者林惠祥先生, 认为海尼·格尔顿是太平洋群岛上这种石器遗存的最早发现者, 他定的名称又可以概括器形的特点, 便由此定名叫作有段石磬。

有段石磬, 最早是在太平洋诸岛上发现的, 当时还弄不清这种特形文物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前, 国事破败, 当时的执政者从不重视文化, 所以在我国偶有发现, 也少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我国考古学界的勤奋努力, 在我国东南沿海广大地区不断地有大量发现。根据时间早晚和器形的演变, 可以看出有段石磬共分三个发展阶段。与海外所见者对比研究, 则看到波利尼西亚群岛所发现的有段石磬, 也有三个发展阶段, 而且器形也相应地与我国东南沿海所发现的相同。1977年,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越人新石器遗址, 遗存共分四个文化层, 有少数有段石磬的遗存。经碳 14 测定, 第四层的文物是距今 7 000 年前的遗物, 第三层约 6 000 年前, 第二层约 5 500 年前, 第一层为 5 000 年前, 由此而确定了有段石磬产生于 7 000 年前而原产地在中国东南沿海。这两点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所公认。太平洋群岛及其东岸所发现的有段石磬, 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国传去, 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关于有段石磬在太平洋各岛的分布情况, 国外考古界早有比较详尽的报道。

(一) 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

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是有段石磬发现最早的地方, 而且发现的数量也较其他各岛为多。因此, 一时曾被命名为波利尼西亚型石磬 (Polynesian adze)。根据国外专门研究有段石磬的学者海尼·格尔顿的发掘结果,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夏威夷 (Hawaii)、马奎萨斯 (Margueses Is)、社会岛 (Society Is)、库克群岛 (Cook Is)、奥斯突拉尔 (Austral Is)、塔希地岛 (Tahiti Is)、查森姆岛 (Chatham Is) 等地都有有段石磬的发现。甚至在新西兰也有所见, 在萨摩亚 (Sanoa Is) 诸岛有少量发现。在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 (Easter Is) 上, 还有南美洲大陆的厄瓜多尔, 也都有发现。

(二) 菲律宾

菲律宾是有段石磬发现比较多的地方。拜耶 (H. A. Beyer) 在菲律宾发掘到数千件。1928年, 专攻南洋考古的荷兰人卡伦费尔 (S. Callenfls) 和拜耶, 认为有段石磬是菲律宾地方专有的新石器器物, 把它定名为菲律宾石磬。1929年英